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乙种)

# 太陽月刊

四月号

(影印本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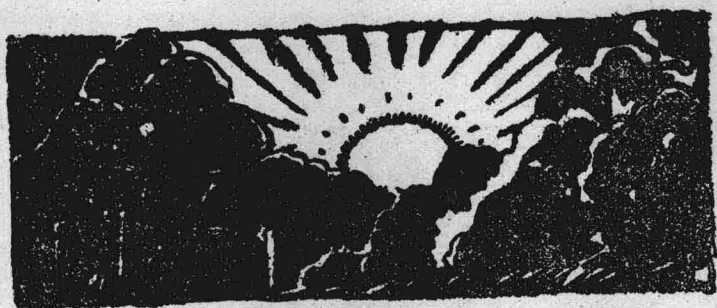
# 太陽月刊

四月號



太陽社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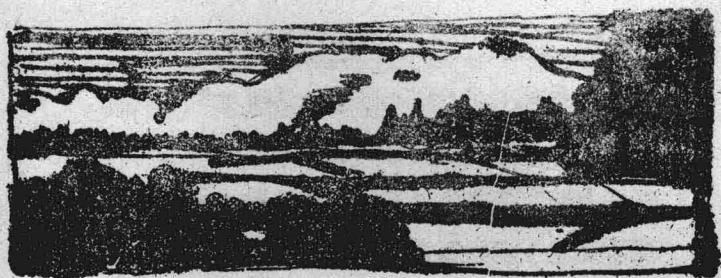
1 9 2 8

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(評論)  | 1—21 | 華希里 |
| 離開我的爸爸(小說)      | 1—13 | 顧仲起 |
| 革命的Y先生(小說)      | 1—12 | 建 南 |
| 黑暗(小說)          | 1—10 | 紹川譯 |
| 兵過之後(畫)         |      | 運 勤 |
| 這時代(畫)          |      | 迅 雷 |
| 批評與抄書(隨筆)       | 1—24 | 錢杏邨 |
| 籐鞭下(小說)         | 1—18 | 楊邨人 |
| 火酒(小說)          | 1—19 | 迅 雷 |
| 死神未到之前(詩)       | 1—35 | 任 夫 |
| 唔(小說)           | 1—34 | 趙 冷 |
| 讀「全部的批判之必要」(札記) | 1—8  | 楊邨人 |
| 編 後             | 1—3  | 編 者 |





# 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

——讀了文學週報的『歡迎太陽』以後——

華希理

一感激與答辯

『太陽』出世後，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，有的並向我們表示着充分的同情，這實在是令我們要引以為快慰的事。最近『文學週報』上，有方璧君的一篇『歡迎太陽』，特地將『太陽』介紹於讀者的面前，並敬祝『太陽』時時上升，四射他的輝光……我們對方君的這種誠意，實在要表示着無涯的感激。

不過我們一方面雖然向方君表示感激，但在別一方面，對於方君所提及的關於現代中國

文學的問題，又不得不誠意地答辯幾句。我們固然很感激方君對於我們的誠意，但是當我們覺着方君有許多意見是謬誤的時候，爲着實現真理起見，我們應當有所討論，或者這種討論，方君也以爲是必要的。方君是我們的友人，當不會以我們的答辯爲多事。

在過去的中國文壇上，只知道謾罵，攻擊與捧場，而不知道有真理的辯論。這是一種俗惡的習慣，不長進的現象，無知識的行動，現在是不應當再繼續下去了。因此，倘若我們現在對於方君有什麼責問的地方，那只是爲着誠意地對於真理的探求，並不是因爲懷着什麼惡意。方君是我們的友人，在友人的面前，不應有什麼虛假的掩飾，或者方君也以爲這種意見是對的。

這是閒話，我們且轉入正文。

二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

在『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』一文中，光慈還有許多話沒有說，致於引起了許多不必要

的誤會。關於現代中國文學對於社會生活落後之一問題，方君有所補充：『我以爲我們的文壇所以不能和我們這時代有極親密的關係，除了蔣君所舉的兩點，還有個重大原因，便是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沒有極親密的關係。……』這一層意思似乎是很對的，然而方君却不能更進一層地說：『文藝的創造者僅僅只承認自己是文藝的創造者，而不承認自己也是時代的創造者，因此他們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地對立着，或互相避免，而不能發生密切的關係。這麼一來，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，永遠是兩種人類，沒有接近的機會，就是接近，也總免除不了兩者之間的隔膜。』

倘若方君的意思是這樣的，那嗎我以爲是對的了，然而方君似乎還未了解這一層，始終視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，爲兩種不同的東西。倘若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永遠是對立着，倘若文藝的創造者不覺悟到自己同時也應該做時代的創造者，也應該追隨着時

代或立在時代前面，爲光明，爲正誼，爲人類的幸福奮鬥，那嗎就使他們跑到十字街頭，與時代的創造者親近一下，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

所謂文藝的創造者應該同時做時代的創造者，這並不是說文藝的創造者應該拿起槍來，去到前敵打仗，或是直接參加革命運動，去領導革命的羣衆。倘若某一個文藝者有這樣的精力，一方面爲文藝的創作，一方面從事實際的工作，那的確是爲我們所馨香禱祝的事情。但是在事實上，這恐怕是不可能的。

我們的意思是，文藝的創造者應認清自己的使命，應確定自己的目的，應把自己的文藝的工作，當做創造時代的工作的一部分。他應當知道自己的一支筆爲着誰個書寫，書寫的結果與時代，與社會有什麼關係。倘若一個從事實際運動的革命黨人，當他拿手槍或寫宣言的當兒，目的是在於爲人類爭自由，爲被壓迫羣衆求解放，那嗎我們的文藝者當拿起自己的筆

來的時候，就應當認清自己的使命是同這位革命黨人的一樣。若如此，所謂實際的革命黨人與文藝者，不過名稱有點不同罷了，其實他們的作用有什麼差異呢？所謂文藝的創造者與時代的創造者，這兩個名詞也就沒有對立着的必要了。

然而我們的現代中國文壇的作家，有幾個是這樣想的呢？時代在咆哮着，呼喊着，震動着，而我們的文藝者却在象牙塔中漫談趣味，低吟花月，似乎生在另一個時間和空間裏，但又不覺悟到自己也應該負着創造時代的使命，而且對於創造時代的人們加以冷眼。這麼一來，所謂文藝的創造者僅僅是文藝的創造者而已，永遠為時代的廢物。

這種現象當然是資產階級的假唯美主義有以造成的。我們的舊的作家，因為受了這種假唯美主義的毒太深了，實在沒有即刻改變過來的可能，有的或至死也不明白：為什麼文藝的創造者同時要做時代的創造者呢？怎樣做法呢



？……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們永遠不能走入十字街頭，所以他們永遠是落在時代的後面，連與時代的創造者發生密切的關係都不可能了。

但是所謂『從革命的浪潮裏湧出來的新作家』，在對於自己的使命的觀念上，那可就與舊作家大大地不同了。這一批新作家是革命的兒子，同時也就是革命的創造者，他們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。他們應當負着時代的使命，同時他們也就明白這種使命是如何地偉大，而應極力以求其實現。換而言之，他們插入文壇，是因為他們負有時代的使命，同時他們承認這種使命是與一般革命黨人所負的使命一樣。因此，他們一方面是文藝的創造者，同時也就是時代的創造者。唯有他們才真正地能表現現代中國社會的生活，捉住時代的心靈。他們以革命的憂樂為憂樂，革命與他們有連帶的關係。但是我們的舊作家對於革命的態度是怎樣的呢？……

### 三客觀呢，還是主觀？

舊作家因為自己根本的觀念是謬誤的，不明白文藝對於時代的使命；所以他們與時代的生活隔離；因為隔離的原故，所以就缺乏實感，得不到新的材料。但是倘若一個作家缺乏對於時代生活的實感，那他無論如何，不會創造能夠表現時代的作品來，因為藝術品的創作，雖然由於作家想像之力，但到底總還要有一點實際生活的根據。

所謂作家要有實感，並不是說藝術品的創作要完全憑本身的經驗，因為這是不可能的，而且照這種理論做去，那藝術的範圍將弄得太狹小了。若寫強盜生活，自己一定要去當強盜；寫娼妓生活，自己一定要去當娼妓；寫死人臨死的心理，自己也一定要去受死一番……那豈不是笑話嗎？若如此，那嗎文藝這件東西可以說完全要消滅了，因為娼妓生活只有娼妓自己才能寫，強盜生活只有強盜自己才能寫……但是我們到現在還未見到娼妓或強盜寫出的文

學作品來。

這是當然的事情。無論誰個，倘若他不是呆子，都明白『文藝品的創造全憑本身的經驗』是一種謬誤的理論。

但是什麼是實感呢？實感的意義可分三層：第一，作者對於某種材料要親近，因為親近才能有觀察的機會；第二，作者要明白某種材料是什麼東西；第三，有了上兩層，作者應確定對於某種材料的態度。如我們的時代是光明與黑暗鬥爭極劇烈的時代，是革命浪潮極高漲的時代，在這個時代裏，有黑暗勢力對於光明運動的襲擊，有軍閥的荒淫無度，有資本家的虐待工人，有勞苦羣衆對於統治階級的反抗，有革命黨人的光榮的犧牲與奮鬥……總之，在這個時代裏，所謂材料的一層，是異常地富足而複雜。照理講，這個時代的作家應當表現這個時代的生活。然而當我們的作家抱着旁觀的態度，或者竟坐在象牙之塔的裏面，根本不顧問這些事情，不但不用自己的心靈去參加社會

的鬥爭，而且連旁觀都不旁觀一下，那嗎，試問他將從何處得到時代生活的實感？他將從什麼地方得到新的材料？當他根本不承認文藝家應當參加社會運動時，那他將怎樣能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物親近？既然沒有這種親近的實感，便不能了解時代浪潮裏所發生的現象，也就不能創造出能表現時代生活的文藝品來。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我以為舊作家已落在時代的後邊了，無論如何不能擔負表現時代生活的責任，而這種責任只得落在新作家的肩上，因為他們有時代生活的實感。

我們並不拒絕舊作家加入革命文學的戰線，倘若他們能改變方向，那我們是極歡迎的。不過一個文學家要改變方向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理性方面，他們也許一時就能承認時代的要求，也許一時就能承認新的傾向，但是在情緒方面，在感覺方面，他們能即刻與舊的世界，和由這個世界所造成的觀念，完完全全地脫離關係麼？這恐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罷。



? .....

照方君的意思，文藝品的創造可以憑藉客觀的觀感，倘若舊作家能用他們的客觀的觀察，也是可以產生新時代的作品的。方君以爲『總是憑藉客觀的觀察爲合於通例』。這是舊的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理論，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對的，其實倘若我們一仔細地研究起來，那我們就覺得所謂『純客觀的觀察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在『關於革命文學』的一文中，光慈曾說過

：『一個作家一定脫離不了社會的關係，在這一種社會的關係之中，他一定有他的經濟的，階級的，政治的地位，——在無形之中，他受這一種地位的關係之支配，而養成了一種階級的心理。也許作家完全覺悟不到這一層，也許他自以爲超乎一切，不受什麼物質利益的束縛，但是在社會的關係上，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，總是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。倘若這位作

家是代表統治階級的，那他的思想，他的情緒，以及他的行動，總都是反革命的，因之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也是如此。倘若這位作家是代表被壓迫的，被剝削的羣衆的，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，將與前者適得其反，——他將歌詠革命，因為革命能夠創造出自由和幸福來。

』

倘若明白這個道理，那就可以知道所謂純客觀的觀察是不可能的。一個作家既然是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，那他觀察他的週遭的事物，一定用這個社會團的眼光來觀察，雖然眼睛是生在他的頭上。若把他當做與社會無關的分子去看，那他的觀察，或者可以說是客觀的；但是若我們把他當做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來看，那他的觀察就成為主觀的了。

因為作家所代表的社會心理之不同，所以他們觀察事物的結果，也將無一致的可能。例如俄國革命本是一件東西，照理講，（自然照着自然主義的理論而講），各個作家對於牠的

觀察，應當是一致的。但是在事實上，有些作家描寫俄國革命時，把革命罵得一塌胡塗，視波爾雪委克爲洪水猛獸；同時，有些作家把俄國革命當成人類社會改造的新紀元，視波爾雪委克爲爭自由的聖徒……這倒是些什麼道理呢？爲什麼他們對於一件事物之觀察的結果，有這樣的懸隔呢？誰個是客觀的觀察者，誰個不是客觀的觀察者？誰個對，誰個不對？回答這個問題時，那也就要問回答者之屬於哪一個社會團了。

誠然，一個作家應當靜心地觀察他週遭的事物，因爲不觀察，他將不了解事物的內容。但是同時我們應當知道，就是這種觀察只是相對的『客觀的』，而沒有『純客觀的』的可能。我們不反對觀察，但是我們要問一個作家當觀察時，是用的那一種的眼光。

現在是革命浪潮極高漲的時代，誰個也沒有權利來禁止舊作家用『客觀的觀察』，產生新時代的作品。但這不是重要的問題。重要的問

題是：舊作家立在什麼地位上用他的『客觀的觀察』？倘若他們還以為自己是超時代的人，還不承認自己應當參加被壓迫羣衆解放的運動，還不曾認清楚革命的意義與要求，那嗎，我敢斷定他們無論『客觀的觀察』觀察到什麼程度，而新時代的作品是永不會產生的！

我們也同方君一樣，希望『舊作家從他們的觀察上產生新時代的作品』。但是他們能不能產生新時代的作品呢？我們拭目以待罷！

#### 四新的啓示呢，還是神祕主義？

方君說，『太陽第一號的小說，一定是實感的描寫了，可是我就覺得像那「女俘虜」，「衝突」，「蟻鬥」中間的實感，好像並非別人一定沒有或觀察不到的。作者所貴乎實感，不在實感本身，而在他能從這裏頭得了新的發現，新的啓示，因而有新的作品。歐洲大戰的時候，知識界從軍者何止千萬，然而在戰場上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，只有巴比塞和拉茲古等三數人而已。所以我以為一個文藝者的題材之有無



，倒不一定在實際材料的有無，而在他有否從那些材料內得到了新發現，新啓示。如果惟實際材料是競，而並不能從那裏得一點新發現，那麼，這些實際材料不過成爲報章上未披露的新聞而已，不能轉化爲文藝作品』。

方君的這一段話，倘若僅僅是汎論，而不將『太陽』上的幾篇短篇小說，及巴比塞在歐戰中的事情指將出來，那我們將要無從討論起，或者沒有討論的可能。不過方君既將事實指出來了，那我們就不得不和方君說幾句話。

方君以爲『太陽』第一號的幾篇小說中間的實感，都是爲別人所有或觀察得到的，而沒有什麼新的發現，新的啓示，所以不見得有什麼出色的地方。我們不知道方君心目中的新的發現和新的啓示是一種什麼東西。倘若方君的意思，以爲只有別人沒有或觀察不到的才值得寫，也只有這種作品才能給人以新的發現和新的啓示，那麼方君簡直是文學上的神秘主義者了，因之方君所謂好的作品，那只是神秘主義的